

贺更行◎著

兼愛天下

墨子伦理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贺更行◎著

兼愛天下

墨子伦理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兼爱天下：墨子伦理思想研究 / 贺更行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2

ISBN 978 - 7 - 5087 - 4301 - 1

I . ①兼… II . ①贺… III . ①墨翟 (前 480 ~ 前 420) - 伦理思想 - 研究 IV . ①B224②B82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4713 号

书 名：兼爱天下：墨子伦理思想研究
著 者：贺更行
责任编辑：刘云燕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编辑部：(010) 66064025

邮购部：(010) 66081078

销售部：(010) 66080300 (010) 66085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80360 (010) 66080880 (010) 66080880

网 址：www.sheb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160mm × 230mm 1/16

印 张：19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序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兼爱天下——墨子伦理思想研究》，是贺更行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是一部有创新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专著。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墨子思想的研究，多偏重于逻辑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对其伦理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本书从“古为今用”的态度，以批判继承的精神，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原则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特点，并分析了墨子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对我国当前道德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墨子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特别重视人伦关系，重视精神境界，具有民族特点的“爱人”精神，重整体精神和公私关系，强调道德修养，重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方式等突出特点，这六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整体的，是自成一个系统的。人伦关系或人伦价值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起点，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支柱，人道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唯一重要方法。

在今天，开展道德建设，必须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继承。孟子曾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孟子·梁惠王下》）没有对传统道德的继承，新的道德就不能更好地发展。正确对待传统，就能够发挥和发扬人类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优秀成果，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人类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一个兴旺发达的民

族，必然是正确地继承了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并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发展着自己传统的民族。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古老的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应该提倡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予以继承和弘扬，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加以提高，从而发展出富有生命力、感召力的新道德，为民族精神增添新内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是为序。

罗国杰

2012年11月1日

自序

这是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我负笈从师以来最大的学业收获。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墨子之学进行研究，很多人都表示不解。的确，在一个西风日盛、喧嚣浮躁的时代，潜心于故纸堆，默思于旧传统，以中国古代思想史为自己博士学位的攻读方向，可谓冷门；而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选择了一个非主流的、中绝长达千年的学派来做，又可谓冷门中的冷门。但我以为，思想的魅力无须用热闹来烘托，其唯有在冷静中才更显清澈。

道不远人。士志于道。我之所以选择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主要因于对现实问题的长期关注和痛苦思索。自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逼迫下，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仍在现代化的路途上苦苦探索。而我们曾经以为，只要引进了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赶超他人。实则不然。西方文化对于积淀深厚的中国文化而言，其乃是一种异质性文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只是制度层面的转型，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的创新。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的确大大丰富了，但我们的精神却在流离失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迅猛蔓延，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更加冷漠疏远。我们今天之所以会遇到如此多的问题，尤其是世人所尤为关注的道德价值观问题的凸现，不仅仅只是西方文化内在矛盾的暴露，还因于我们对自身传统的武断撕裂。人类会走向何处？毁灭还是新生？当一种文明不足以给人类的未来指引方向时，各古老文明中的智慧，或许会给今天的我们更加意味深长的启示——

“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①。选题“墨子伦理思想研究”，就是想通过梳理墨子这位先秦哲人的思想脉络，在和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中，企望探寻中国文化的源头及其流向。因为，只有知道了我们从哪儿来，方可确定我们应该走去的方向。

孔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② 墨子之学，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传统中的异端，曾经显耀，也一度中绝，但其大起大落之命运和中华民族命运所具有的高度相关性，的确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察思。儒墨两家，同为先秦显学，皆怀悲天悯人之心，俱负经世济民之志，就两家立学境界与思想规模而言，高低难分，大小难辨。但是，墨家之所以会和儒家激烈对手后惨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能够立足现实，苦苦保守文化之根；墨家则力反传统，激进跃入理想之境。儒家在继承了文化传统的同时，又积极从内部创新，不断地因革损益；墨家则对文化传统予以彻底否定，力图开辟全新的世界。物极而反。墨家虽然对其时的礼乐文化传统的突破远较儒家为激进，但在思想实质上却比儒家远为落后——墨子将自己的思想学说最后都回归于以鬼神信仰为内容的原始宗教，实际上比儒家更为复古。保守者有创新，激进者却复古，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悖论？所以说，任何思想学说，当然包括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倘若无视社会现实，彻底脱离本土本源，势必会遭遇夭折遗弃的命运——显赫一时的墨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殷鉴不远。

若说中国今日的危机，主要已是文化的危机；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困境。当前，中国文化所处的境遇依然是晚清以来的承续，中国文化依然处于自秦汉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大变局之中，并且较之春秋战国之际更为动荡不明，这，亦迫使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走向更为关注。西学东渐以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无数的忧患之士为了中国文化复兴，自觉地进行了不懈探索和艰苦努力，尽管皆情真意切，见解却仁智不同。故虽有众声喧哗不断，然黄钟大吕几希。“激进”与“保守”，长期以来亦是辩难不已，是非不明，余波及今。

① 《墨子·大取》。

② 《论语·卫灵公》。

就思想学说而言，风行一时的未必就能世世传承，遭遇冷落的或许更富蕴有生命力。自近代至今，国人对本族文化从痛心自省到局部修正，从局部修正到全部舍弃，从全部舍弃继而转为热烈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因为国运的动荡，使得文化传统的传承、创新，始终不能在清澈的理性思考中进行。更有一些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社会激进改造的需要，多发惊世骇俗之偏激言论；而越是惊世骇俗、哗众取宠，也越容易得到思想浮躁者的吹捧和一知半解者的欢呼。一旦偏激成为时尚，媚俗成为风潮，其所造的汹涌“声势”，也就无情地淹没了睿智冷静之音。故而，残酷现实对道德理想的扭曲，急功近利对文化传承的消解，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发自道德良知以赶超西方文化的学习运动步履艰难的真正原因。对立竿见影的现实功利的热望，往往也会促使革命道德精神的失常。

我以为，激进并非绝对正确，保守亦非完全错误。过犹不及。唯有执中用和，因革损益，无过无不及，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以较为合理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传统文化，从而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中各家各派之间的旧有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现有的紧张关系。最终，实现我们大家的共同目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目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人物	17
一、社会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18
二、思想 道术将为天下裂	23
三、其人其行	26
四、其书	32
五、其学	37
第二章 兼爱：思想核心的革新	47
一、以兼为道	48
二、兼相爱交相利	58
三、非攻不非战	63
四、“仁”与“兼” 孔墨之异同	75
第三章 贵义：道德原则的确立	85
一、兼以义正	86
二、兴天下之利	99
三、义利观 义利并重	105
四、合其志功而观	111

第四章 节用：经济伦理的倡导	119
一、对劳动的道德肯定	120
二、尚俭的消费道德观	126
三、功利主义礼乐观	141
四、苦行主义	155
第五章 尚贤：政治伦理的建构	165
一、天下“尚同”：道德理想国	166
二、圣王“尚贤”：政治理想的道德保证	172
三、平等与专制的历史困境	180
第六章 天志与明鬼：以宗教为后援	189
一、传统信仰之残存	190
二、经验主义倾向使然	199
三、“非命”与“尊天”：现实手段与精神后盾	207
四、天鬼即民意：威慑性的道德赏罚力量	215
第七章 潜流隐行与复兴冲动	223
一、中绝	224
二、儒、法的汲取	239
三、早期道教的承续	255
四、墨侠与绿林精神	261
五、近代启蒙思潮中的短暂“复兴”	271
结语 /	282
跋 /	289
附记 /	291

绪 论

墨子是中国先秦伟大的思想家，墨子之学乃先秦“显学”。孟子曾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①荀子也有感叹：“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②韩非子评述道：“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③《吕氏春秋》亦记载曰：“（孔子墨翟）皆死久矣，从属弥丰，充满天下。”^④在整个战国时代，墨子之学和其他学派争锋激烈，墨家学派乃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举足轻重的一家，并且“孔墨”并称，长期跻身“显学”。但是，随着群雄争霸时代的终结与秦汉帝国的相继建立，墨子之学历经了秦初坑火之祸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相继打击之后，便开始逐渐衰落，不知不觉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最终沦为“绝学”。然而，千年的沉寂并没有把墨子及其学派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去。时至有清一代，当西方文化以横绝天下之势登陆中国，古老的中国文化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墨子之学在有民族忧患意识的仁人志士的发掘、鼓吹之下，出人意外地在清末民初一度“复兴”，再领风骚。

两千多年来，墨子之学历经坎坷，人们对之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直至今日仍呈两极分化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墨学的起落沉浮与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荀子·成相》。

③ 《韩非子·显学》。

④ 《吕氏春秋·当染》。

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变迁所具有的高度相关性，墨学流传的艰难曲折与中国文化兴衰起伏的惊人契合，墨家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在中国民间社会长期的潜流隐行，再加之墨学的平民性质、科学价值和逻辑内涵的发现与“西学”传入的不解之缘，这一切，皆昭示出墨学的生命力和特有价值。而且，如墨子之学影响曾经如此之大，但中绝时间却如此之长，并且在销声匿迹千年以后又一次以振世救弊之目的而“复兴”的学说，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属少见，令人感慨，发人深省。不过，也正因为经历了如此多的沉浮褒贬，使得墨子之学比其他理论体系经历了更多的磨砺，其优劣之处尽皆显露，其启示意义也更加彰显。

综观先秦诸子，其思想学说的共同特点都是出于匡时救世之动机，力图达到重整乱世之目的，即为克乱求治、济世救民而积极探索“治道”^①。墨子之学也不例外，其宏大庞杂，无所不包，俨然是一个“治国大纲”。而且，墨子之学的突出特色是从平民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立足社会实践，既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又以激进的态度大胆创新，其平民性、革新性、功用性极其鲜明。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尚同”、“尚贤”、“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十论”，包含了其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军事诸思想，集中反映了其所代表的平民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诉求，极具平民思想家的特征。但这在当时也具有强烈的激进与空想色彩，故与儒家所尊奉的“圣王之道”相对立，被荀子称为“役夫之道”^②。

墨子之学不仅与儒学相对立，而且与同时代其他各家的思想也相异趣，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因为墨子直言不讳自居“贱人”，理直气壮地代表平民小生产者的利益，所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生产和实践经验，这便致使其思想学说在学理上具有经验论形态，内涵有工具理性精神。从思维模式来看，墨子之学强调物我

① 司马谈言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荀子·王霸》。

的对立；从思维内容上看，其注重经验知识及其获得的方法，以知识的客观性、有效性为指向。以这种外向型哲学思维和平民政治诉求为导向，墨子之学在对客观外物的认识和重整价值观体系上，凸现工具理性，“强力”而“非命”，以激励人的内在能力来改造外在世界，以追求人人平等、兼爱互利的现世幸福为最终目的。故而，墨学的价值取向，既不是单纯追求个人福利的利己主义，也不是以道义论为导向的纯粹的整体主义，而是既高度“贵义”又大力“尚利”，辩证地认识义利二者的关系，极具功利主义的理论特色。

就墨子的伦理思想而言，其以“兼爱”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价值体系。“兼爱”说乃墨子首次提出。虽然与孔子一样都讲爱人，但墨子的“兼爱”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仁爱”有很大的不同。儒家的“仁爱”观源于西周礼制所规定的“亲亲之杀，尊贤之等”^①。“亲亲之杀”，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尊贤之等”，强调人与人在政治上的上下等级关系。政治上的尊卑关系又依赖于血缘性的伦理关系。在这一关系网络中，每一个人都处于政治伦理上的依附或隶属状态，都不是政治上的独立存在，难以形成人人平等的意识。墨子所批判的就是这种爱有差等的仁爱观，力图把人从血缘性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强调虽“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②，张扬人格独立与平等意识，赋予个人政治独立性和身份对等性。所以说，孔子的思路是在维护旧统的前提下对现有秩序有所损益、渐进变革，致思的重心是让现有的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各归其位——“克己复礼为仁”，“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③；墨子则力图在突破旧统后重建秩序，致思的重心则是最广大下层民众的生存福利——“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从社会下层的生存危机中引申而出，“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则直接切入最广大民众的生存角度。

就这样，以博大无私的“兼爱”为核心，墨子将其道德理想落

^① 《礼记·中庸》。

^② 《墨子·尚贤上》。

^③ 《论语·季氏》。

实到社会个体之间，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时候，则以实现人人之间“兼相爱交相利”为起点，并且以万民百姓之大利为道德正义的标准，“贵义”而行，以“义”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既然主张“兼爱”，在有关国计民生之经济伦理上，统治者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费与被统治者万民百姓的饥寒交迫的现状，是和“兼爱”格格不入的，这又导出其“节用”主张。在政治伦理的构建上，墨子认为，唯有使天下同一于兼爱无私的贤者的统治之下，方可实现天下大同，故而倡导“尚贤”。为了保证“兼爱”理想在现实社会中的有效实践，体现其“兼爱”意志的“天鬼”乃是最高的道德评判准则和最后的道德惩戒力量。所以说，“兼爱”是墨子伦理思想的灵魂，居于其伦理思想的中心，是贯穿于其道德体系的一根主线。唯有“兼爱”，才使墨子的伦理思想与其他各家各派的伦理思想区别开来，真正体现了墨子伦理思想的本质，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

那么，“兼爱”道德理想的实现，即如何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为人们所接受和践履，则必须进一步具体化为一定的道德原则。也就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从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出发，才符合“兼爱”的精神。墨子认为“兼之为道也，义正”^①，“万事莫贵于义”^②，“义者，正也”^③。“义”，就是体现“兼爱”的基本道德原则，即人们在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关系的时候，应该以“义”为出发点和目的，指导自己的道德实践。在墨子的道德体系中，“兼爱”与“贵义”是相辅相成、内在联系的。既然“兼爱”，那就要平等无私地爱人，当然就不能自私自利，应该以天下人民的大利为重为“义”，尊重他人利益，先人后己，先公后私；“贵义”，强调的是在“兼爱”的过程中，在处理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要贯彻天下公“义”高于个人私利的思想，更好地处理各种利益矛盾，从而使人们的道德行为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效益。故而，在墨子的“贵义”道德原则中，自始至终地贯彻“兼

① 《墨子·天志下》。

② 《墨子·贵义》。

③ 《墨子·天志下》。

爱”这一道德核心的要求。

更具特色的是，墨子虽然口口声声“贵义”，但亦毫不讳言“利”字，在义利观上坚持义利并重。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反传统的意义。孔子强调的“义”不以任何事物为目的，而一切事物都必须以“义”为目的，即所谓先义后利、以义生利，具有道德义务论倾向。而在墨子这里则恰恰相反，其是在“尚利”的前提下提出“贵义”口号的，所贵之“义”就是“天下人民之大利”，这才是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故具有道德目的论倾向。不仅与儒家的义务论不同，墨子也和法家的重利轻义的极端功利主义相左。因其所理解的“利”，首先是指天下人民之大利，而不是指狭隘的帝王君主之利。并且，墨子既坚持功利原则，又同时强调道义的重要性，主张“循义求利”，对于法家所主张的唯利是图和藐视道德的理论和现象予以坚决抵制和抨击，颇具有规则功利主义的理论特征^①。正因为墨子的义利并重、义利统一之说富含辩证色彩，这也致使其在道德评价上独具慧眼，认为判断人们行为的善恶，应该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合其志功”^②的观点。

以“兼爱”思想指导经济伦理的建构，墨子倡言“节用”。墨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如果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强力”说和“节用”说。“强力”，是墨子通过对劳动的道德肯定而试图达到经济“开源”的目的；“节用”，则是墨子在经济消费中大力提倡节俭而试图达到“节流”的目的。对劳动与节俭的道德性思考，对劳动的肯定和对节俭的倡导，既和墨子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现实状况有关，也和墨子的出身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相一致。从抽象的理论方面来说，墨子“节用”经济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都是根据“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③这个原则来展开的。其既是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端开出的济世利民的药方，又是对王公大人们的奢侈靡淫的生活方式的激烈

^① 有关墨学的规则功利主义特征，详见后文第三章的论述。

^② 《墨子·鲁问》。

^③ 《墨子·节用中》。

批判，这也迫使其不得不正面挑战维护礼乐文化、坚持厚葬久丧的儒家思想，逻辑地发展出“非乐”、“节葬”、“非儒”诸观点；而其将“节用”思想个体化，则自然发展出以自苦奉献、均分财产、平等相处为内容的苦行主义生活方式。正因为墨子对“兼爱”思想严格而彻底地贯彻，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应该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而判定不合其政治目的、经济功利和道德追求的礼乐厚葬都属无益，对一切不实用的娱乐消费、礼仪制度采取了坚决的否定态度——过犹不及，对现实功利的狭隘理解，对现世生活的过度刻苦，使之最终陷入了荀子所批评的“蔽于用而不知文”^① 的困境。

“兼爱”是墨子理想的社会组织的原理，“尚同”是墨子所梦想的天下一统的设计，“尚贤”是墨子实现大同理想国的政制。将“兼爱”贯彻到社会政治实践，墨子倡导以“尚贤”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伦理思想。首先，墨子设计了一个“天下尚同”的道德理想国。在墨子的“尚同”理想国中，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由“天”所选立，天子听从“天志”，代表民意。而自天子以下的各级政长，都是根据天子的政治道德标准自上而下选择出来的，然后再从最基层的里长开始“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②，自下而上层层上同，最后上同于天子。这样，臣民只能上同，而不能下比，臣民与天子的思想、道德、言行等达到了高度统一。经过这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过程，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与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就会得以实现，如此，就出现了一个高度统一、安定和平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可是，既然墨子一生苦苦追求人人兼爱的平等道德理想，但其所设计出来的道德理想国却具有明显的专制色彩，为此，他提出的补救措施就是“尚贤”。墨子认为，各级统治者尤其是天子的品质才干对于保证“尚同”的实现至关重要，故“尚同”的前提就是，整个国家官僚体系从上到下的各级政长都应该是足资民众效法的“贤”

① 《荀子·解蔽》。

② 《墨子·尚同中》。

者，天子乃是“一同天下之义”的最大贤者。从理论上讲，“尚贤”是“尚同”的保证：在对各级统治成员的选择任用上，如果不实行“尚贤”的组织原则，则难以实现“尚同”的政治原则，而且也与尚同的目的相违背，故墨子呼吁“夫尚贤者，政之本也”^①。由此可见，墨子以尚贤为政之本，并不是空泛地宣扬以德服人，而是动用社会的力量乃至国家政权的力量举“贤”抑“不肖”，旗帜鲜明地褒善贬恶，这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其力图打破贵族世袭、贵贱之分、等级界限的传统，向西周礼制发起了有力挑战。但事实上，墨子所设计的以“尚贤”为保证条件的“尚同”理想国，在理论上可以说是一种“有条件的”君主专制主义，可称之为“开明专制”。因为他并非以天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以代表民意的“天志”作为天子的选择者和监督者。但正因为“天志”监督力量的软弱无形，“尚同”如果落实到现实政治之中，就只能变形为无条件的君主专制主义了。所以说，尽管墨子以“兼爱”为号召，热忱追求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大力抨击社会不义，无情谴责等级制度，但却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成为一个君主专制主义的大力提倡者和积极鼓吹者。

儒家的“仁爱”，以自然的血缘亲情来维护和保证落实，那博大无私的“兼爱”又基于何处呢？如果仅仅只是以“交相利”为回报，那如果有人只是一味地“享受”他人的爱，而不“给予”他人爱，那又如何处置呢？即“兼爱”最高的道德评判准则与最后的道德惩戒是什么？墨子为此提出了“天鬼”说。墨子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鬼神崇拜的传统，其“天鬼”说颇具鬼神工具说的意味，即视鬼神同工匠的规矩，是维护社会道德的工具，欲以天鬼的意志整饬人间的价值冲突。而“天鬼”的本性，就是墨子所口口声声所宣扬的“兼相爱交相利”，会对人间的善恶明察秋毫，赏善罚恶。不仅如此，墨子一面高举“天鬼”之传统大旗，一面却向当时流行的“天命”观念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其从经验主义认识论出发，从直接生活经验的角度否定了天命之后；又从功利主义的目的论出发，认为笃信天命对治理社会国家毫无益处，而富贵、贫贱之区别，重在

^① 《墨子·尚贤上》。